



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 简报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

2021年11月17日第5期

中非减贫合作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

2021年10月16日，由广外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承办、外交部非洲司支持的“中非减贫合作”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成功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中方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经济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此外本次会议还邀请了非洲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为：贝宁多哥—纳米比亚ATA咨询公司、刚果世界基金会、肯尼亚中非联络中心、肯尼亚瑞拉大学、塞内加尔BEM大学、埃及开办大学和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尼中发展研究院。会议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充分交流和深入研讨。

一、中国减贫对非洲的意义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关于中国减贫的方法和路径均可以为非洲国家带来很好的借鉴作用。2020年中国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体现在落后的农村容貌得到了改变，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增长，为非洲提供了大量脱贫经验。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国向非洲国家分享了诸多经验，把很多减贫项目也带到了非洲。现在减贫已经成为中非合作当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不论是中非合作论坛，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均使非洲国家获益良多。为此，非洲国家应该广泛借鉴上述平台，找到双方合作契合点，巩固中国和非洲的友好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1.1 非洲贫困的成因

关于非洲贫困的成因，除了传统的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分析外，与会专家创造性地提出从精神层面分析非洲贫困的成因。其中，精神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宗教。宗教天然地抑制商业，同时也抑制科学。非洲常年被外来武力冲击，但又无力抵抗，在物质

上没有立足点，就要从精神上获得补偿效应，这其实是一种弱者的抵抗方式。这种抵抗退守到精神上，便是借助宗教的力量进行精神抵抗，来满足非洲人的精神需求。所谓精神抵抗就是重视内向坚守，精神方面虚无主义的流行和离散情绪的弥漫是精神抵抗长期塑造的结果。这种结果虽然在物质上消极抵御了西方，但也造成了非洲的长期贫困，时至今日非洲仍然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挣扎、撕裂。因此，在非洲范围内讨论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话题，更是一个文化话题。

1.2 中国减贫经验对非洲的启示

在涉及中国减贫经验对非洲的启示讨论中，与会专家总结出如下五点：

第一，稳定的政策规划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稳定，政策制定具有延续性。非洲若想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可延续的政治环境，但这对于非洲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非洲国家政权更迭比较频繁，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性，难以像中国一样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二，重视中长期规划。中国不仅善于制定中长期规划，而且十分重视对于教育以及科研的投入。正是由于在科研领域的长期投入，中国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全球领先，特别是在专利申请上已经连续2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科教发展为中国减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经济发展模式本土化。在中国的经验里可以发现，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完全依照外国的模式，这意味非洲国家不需要去重新发明什么东西，仅需要去寻找一个成功的案例，并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加以整合便可以得到适用于本国的发展模式。比如，将中国的中医引入非洲，不仅可以与中医与西医的医疗方法、观念相结合，将两种模式取长补短，也可以为中非双方带来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第四，发展经济学的再创新。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减贫的基本概念与中国减贫经验达到的最终目标不谋而合，这是对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再一次证明。此外，根据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及减贫战略，中国的减贫实践、经验是具有科学性的，其实现路径、切入点均符合国际普遍认可的减贫理论。因此，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对发展经济学减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五，“国家+企业”的扶贫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与企业合作所带来的脱贫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这种经验也是被广泛认可的，但其缺点是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上，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单一企业投资基础设施会面临很大困难，因此需要政府适时引导，突破单一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为其更好地实现脱贫夯实基础。

二、中非民生领域产能合作

为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目前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非合作的一个全新的立足点，应重点关注民生领域如农业、医疗、就业、安全等。此外，中非经贸合作是一个双赢合作，兼具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中国与非洲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中国与非洲两种市场资源可以得到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中非合作可以同时解决中国拥有技术和产业但缺乏资源、非洲缺乏技术和产业但拥有资源的问题。中国通过对非洲进行农业技术转移使非洲获得农业现代化技术、通过派遣医疗队帮助非洲国家构建自身的卫生体系等，均是惠及非洲百姓、帮助发展非洲产业、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2.1 中非经贸合作的现状

2020年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由于非洲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其自身经济恢复能力比较差，因此非洲在这时更需要来自中国的帮助和支持。一方面，中国应逐步开放对非洲农产品的进口，如受中国人民喜爱的腰果、咖啡等；另一方面，中非合作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中央层面，更应该从民间的角度来推动，中非合作应该关注中非关系中的每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宏观因素。

中国投资者层面。在非投资的中国投资者大多是中小民营企业或个体户、投资项目多为技术门槛比较低的产业或商业项目，这类项目的产能在中国基本上属于优势产能，非常适合非洲国家现阶段的产业发展水平，满足当地群众对低价生活必需品的迫切需求。而且这类项目投资者和经营者会有扎根非洲的想法，因此劳资关系比较融洽。但中小型企业会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疫情尚未结束、非洲国家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中小微企业很难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中非合作更多偏向于大型的民生项目，对中小型企业项目的扶持力度明显不足。

非洲国家层面。首先，非洲国家应该重视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通过对非洲国家的公民调查可以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非洲国家治理能力较为低下。其次，应扩大中非合作的领域。中国在非洲不论是投资、贸易、工程承包等均已经在非洲获得较大的影响力，总体来看，非洲是受到外部影响较大的地区，中国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需要帮助非洲稳定商品和资源。最后，非洲需要中国的经验来进行自己的未来规划，因此中国需要去更多地了解非洲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愿景，非洲国家也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2.2 中非融资合作

中非融资合作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但目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依旧是融资难。根据IMF的统计，非洲国家发展需要1.9万亿美元的支持，这无疑加剧了

非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非洲发展融资为中非合作带来了新机遇，尤其是公共卫生、就业减贫等领域，中非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效果，这无疑为中非发展融资打了一剂强心剂。为此，非洲国家应将中非合作纳入到非洲自身的发展议程当中，有助于非洲国家更大程度地将中非发展融资资金用到亟待解决的领域上。

2.3 中非产能合作

非洲大部分国家依旧靠出口初级农产品获取外汇，但这对本国的工业化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由于工业化没有得到发展，围绕工业化发展的制造业和物流业，近年来均没有取得显著的增长。因此，中非产能合作大有可为。

首先，中非减贫合作应依据本地化原则。充分利用当地员工，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也可以助力当地减贫，本地化原则可以凭借非洲当地的力量、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为企业和社区带来收益。这样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也能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筑夯实基础。

其次，中非合作具有十分稳定的政治基础，有助于非洲发展工业化。在此之上建立的非洲自贸区，不仅有利于非洲工业化发展，也有利于非洲大陆的一体化。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电子制造等，这恰好是非洲亟需的领域，双方合作符合市场规律。非洲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是非常艰苦的，少数非洲国家凭借自身条件优势，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但更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在非洲没有依据当地实际情况来进行改革，这对于非洲工业化改革是极其不利的，因此非洲国家之间需要进行政策协调与配合，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培养非洲工业化所需的造血功能。另一方面，需要确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政策目标，通过设立长期规划，逐步完善工业化体系。

最后，中非应加大农业产业方面的合作。一方面，非洲国家大多以出口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外汇来源，若非洲国家积极引入中国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可以通过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制造业模式，创造更多外汇，并带动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满足非洲国家农民的根本需求，提高农民收入，也满足了非洲国家政府对于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并且可以帮助更多贫困群体脱贫致富。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双循环”正在寻求外循环的具体途径，选择以农业产业化为具体路径，不仅可以帮助我国相关农业企业走进非洲，转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还可以提升非洲农业生产，在特殊时期有利于保证我国国内的粮食安全。

三、总结与讨论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发展问题，在新冠疫情下则集中体现在医疗问题上。中国在2020年完成了8亿人口的脱贫攻坚工作，这对于广大非洲国家来说是一次鼓舞。但非洲国家需要明确，中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通过不断的改革提升了自身的工业化水平，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当然，这无疑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顽强拼搏的国家。在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参考的经验。为此，中非应该加大合作力度，特别是在减贫领域，应该重点关注教育、人才在中非合作当中的作用。此外，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重长远发展，很多投资者来非洲短期的留守，想赚快钱，这是不可持续的，中非合作应更加注重长期的发展，这样才能促成双赢局面。

智库观点荟萃

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如何建立有效的人道主义治理

观点指出：人道主义制度改革应延伸到国际治理领域。在国际发展领域，OECD的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NGO）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这些组织或机构当中进行人道主义治理改革将对整个国际发展行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人道主义组织的管理机构和全系统治理是具有排他性的，仅仅涉及少数政府、和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对于国际发展领域的下游，或那些有意愿和能力带头应对灾难的东道国政府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切入点。这是由于，从顶层设计上来看，国际发展领域所实施的项目中如果想要测量一个发展项目的有效性更多的是要依靠一个有监督能力的项目实施机构来进行项目的进程工作，但处于下游的政府几乎没有能力胜任此工作。为此，国际发展伙伴关系的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应该有效地构建一个可以获取民众真实意见的平台，以配合共同需求评估和政策制定，并相应地调动和调整发展项目资源。这样通过援助管理机构、援助方以及公众三方结合可以使人道主义援助更佳有效地进行。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我们最应该担心的近期气候影响是什么？

观点指出：根据数百名专家的测算，在未来的10年内，气候灾害预计将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目前来看，许多危害是不可避免的，但采取适当的行动可以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将极端气候的恶劣影响降至较低的程度。其中，近年受到世界广泛关注的气候危害事件都集中于非洲和亚洲地区，这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粮食安全及居住地受到侵害的问题，部分原因来自于干旱、降雨模式变化或极端炎热等自然危害。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最脆弱的地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最为严重的，而且容易引发联动效应，加剧地区和国际级的影响。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各国都反复强调的“人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这句话，在应对气候危害方面也是同样至关重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国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风险最高地区的社会经济脆弱性问题。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性的气候危害的，这种连锁反映会将地区级的危险转化为全球风险。

美国兰德智库：中俄合作决定因素，未来轨迹，对美国的影响

观点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自2014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关系，加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合作的历史、动机和约束的关系发现，中国和俄罗斯在21世纪更紧密合作的主要动机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持续性威胁。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持续下去。如果美国政策没有重大变化（而且可能是不受欢迎的），美国政府或军队在影响中俄关系的轨迹上几乎无能为力。美国军方可以为中俄更大合作的预期做准备，包括期待中俄军事装备的进一步扩散、更多的联合规划和演习、潜在的联合基地，以及最终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后阿富汗美国与世界——国际社会的期待与焦虑

观点指出：关于喀布尔沦陷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影响，美国国内意见褒贬不一。一方面，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国际声誉已经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 严厉批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违反拜登政府意图的、一团糟的决定。由于阿富汗政府和武装力量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崩溃，国际社会20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阿富汗建国计划的努力付之东流。许多曾与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日本等合作的阿富汗人被抛在后面，无法逃到国外。他们辩称，这些不足已引起世界对美国信誉的强烈怀疑。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阿富汗撤军将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是降低。乔

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 (Charles Kupchan) 等人认为, 1975 年西贡的沦陷并未导致最初被鼓吹的美国衰落, 相反的是, 在那之后真正发生的是美国权力的恢复。美国从不可避免战争中抽身而出, 得以重建国内局势, 与苏联和中国发展更好的外交, 并最终赢得冷战。他们的观点是, 喀布尔的沦陷很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通过结束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阿富汗战争, 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 (美国总统乔·拜登) 的“真正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身上。从长远来看, 在盟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 他们可以巩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 加快资本市场的低碳转型, 仍需要更好的可持续性数据

观点指出: 欧洲低碳转型聚焦于资本对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欧盟已经制定了适用于金融市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分类和披露规则的全球标准。但有关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特征数据的质量问题, 正日益成为监管机构的关注焦点。随着, ESG数据行业的快速扩张, 其获取数据的方法和渠道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目前所提供的数据产品已不再局限于评级和排名, 还添加了包括筛查服务、指数和基准等内容。尽管相关机构正在积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但数据输入和公司原始数据获取仍是一个主要限制因素。目前, 欧盟计划披露更详细、更广泛的企业可持续性信息, 拟可以通过建造集中化的数据平台来获取相关ESG数据。但这一计划对投资者和数据提供商来说, 并没有直接的好处。然而, 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 相信未来可能会填补这些不足, 如利用地球观测数据、公司报告的自动分析, 以及基于支付数据的碳足迹核算等新方法可以为ESG数据提供新鲜的血液。

主编: 刘继森
校对: 徐冠曦 计飞
电话/传真: +86-20-86318925
地址: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编辑: 徐冠曦
邮编: 510420
网站地址:
<https://gbqy.gdufs.edu.cn/>
邮箱地址: gbqy2021@163.com